

犬儒抑或解放

《100 毛》的快感政治

Cynicism or Emancipation

The Pleasure Politics of *100 Most*

駱穎佳 *

Peter Lok

摘要

《100 毛》雜誌是近年深受香港年輕人愛戴的刊物，而當中對香港保守政治的嘲諷及批判，更被某些社運人士視為一種植根香港本土的良心媒體。但在 2016 年一次由《100 毛》主辦的《毛記電視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的節目中，卻在贊助及宣傳手法上，引來社交媒體上的爭議，而正反雙方不少是知名的社運人士及意見領袖（KOL）。爭議的核心是：《100 毛》這種對政治冷嘲熱諷的媒體，究竟能否替社會帶來真正的「解放」，抑或只是一種「犬儒」的「偽解放」？本文會以這個爭論作起始點，並參考文化研究過去有關快感政治的論爭，檢視《分獎典禮》論爭之餘，更希望思考一種能夠帶來社會轉化的快感政治的可能。

* 駱穎佳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通識及文化研究課程）講師
收稿日期：2017 年 7 月 14 日；通過日期：2017 年 10 月 17 日。

關鍵字

《100 毛》、快感政治、香港文化、情感政治、網路文化

Abstract

A Hong Kong-based commercial youth magazine, “100 Most,” has recently been well-received by local teenagers. The editorial style of 100 Most, especially its critical but ironic stance toward conservative Hong Kong politics, has received support even from certain local political activists. However, an entertainment show produced by 100 Most in 2016 entitled “TV Most 1st Guy Ten Big Ging Cook Gum Cook Awards Distribution,” sparked a debate among social activists and key opinion leaders on social media in terms of its sponsorship and promotion. A core question generated from the debate was, “can 100 Most’s ironic approach to politics lead to political emancipation or is this approach simply a cynical take on politics that does not bring hopes of causing tru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work attempts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by referring to the debate about the award show and that of pleasure 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Through these efforts, a possibility of truly developing pleasure politics is explored as well.

Keywords

100 Most, Hong Kong Culture, Network Culture, Pleasure Politics, Politics of Emotion.

一 引言

本文以《100 毛》雜誌作為案例，思考文化研究一個重要（也或是老生常談）的課題：流行文化的快感作用。究竟好像《100 毛》那樣，從冷嘲熱諷社會政治現況得來的快感是「有害」

抑或「無害」? 能夠有助社會改變的「解放」抑或無助社會改變的「偽解放」? 就此，本文會以《毛記電視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下稱《典禮》) 所引發的社會爭論作為研究焦點，探索由《100毛》所衍生出來的快感政治有什麼值得反思的地方，特別是左翼主義者對快感政治有何過度判斷。本文提出快感政治，若無帶人走向更深刻的、具遠景的社會轉化，勢將僅為一種犬儒式的偽解放。當務之急就是要力尋一種能夠帶來社會轉化的快感政治。

二 作為本土論述的《100毛》

《100毛》這個雜誌名稱是網絡世界的政治打手「五毛黨」啓發出來的。雖則兩者並無任何統屬關係。但由於雜誌的售價每本港幣10元，即1毛錢的100倍，所以才叫《100毛》。《100毛》創辦於2013年，當時社會政治混亂，相繼出現政改爭議、高官貪污、港視又不獲發牌等，政府跟人民對立的狀態，令《100毛》創辦人林日曦，想透過幽默及諷刺的手法打破這種社會悶局，替年輕人出一出氣(不詳，2015)。所以《100毛》的出現是帶着要為香港青少年發聲打氣這一點使命的。當然，《100毛》的青年讀者群中的「青年」更多是指職場新鮮人及大專生。根據一項調查指出(Yip, 2016)，在《100毛》的讀者年齡層中，大專生佔18%，而中學生(13-17歲)則佔13.31%，反而職場新鮮人則佔15.12%。換言之，《100毛》的讀者仍是以職青及大專生居多。

然而，《100毛》也不只是一份青年雜誌，更可能是一種具政治性質的、正在建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本土論述。要清楚的是，政治諷刺(所謂「抽水」)一直都是《100毛》的賣點，尤以改圖方式嘲諷親中的建制派及政治人物最為擅長。文化評

論人阿果就曾指出：

「《100毛》出生的年頭，是香港社會動盪的一年：梁振英僭建、張震遠借錢、陳茂波劊房、林奮強賣樓、麥齊光房津、湯顯明茅台……所謂廉潔和法治，在這個年頭，開始成了空談，化作口號。」（阿果，2016）

第三任特首梁振英（2012-2017）上台後所帶來的政治動盪，進一步令港人害怕一直引以為榮的香港核心價值受到破壞。這種不安的氛圍亦有利《100毛》的出現。例如，《100毛》的姊妹刊物《黑紙》，在2012年的國民教育風波中，發揮過一定的抗爭作用。其時，廣場上，許多示威群眾舉起的「撤回」標語，就是《黑紙》的產品。因而，阿果繼續指出，近年來，《100毛》對建構香港新一代人的本土意識是有很大的貢獻。一方面，《100毛》透過自嘲，取笑各個小群體（「強國人」、「港女」、「老細」）來建立香港人的精神面貌，有助扣連香港人的價值；另一方面，《100毛》又常挑戰社會常識（如：「努力會發達」、「讀書會搵到好工」），進而激發新一代人對抗主流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及洗腦工程。由此可見，《100毛》已在新一代的圈子中重新打造本土身分，在日漸強大的社交媒體的影響下，很有可能將大家已經倒背如流的「香港人身分故事」重新改寫（同上）。

三 《典禮》的論爭

雖則《100毛》在政治上的言論一直都是大膽見稱，也敢於替各種本土社運（反國教、雨傘運動）站台而又勇於挑戰政治體制，但這種帶有商業味的本土媒體也不一定完全受社運圈子/活躍分子歡迎。這種情況從《典禮》引發出來的事後爭議

可見一斑。

《典禮》於 2016 年 1 月 11 日，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此項《典禮》緣起於《100 毛》旗下網絡媒體「毛記電視」的網上節目，而這個網上節目的主要賣點在於反諷「大台」（無線電視）《勁歌金曲》的「分豬肉」式頒獎文化。當有此《典禮》舉行的消息一出，網民反應熱烈，門票迅速售罄，就連主流媒體 Now 電視台也安排現場直播。概括來說，《典禮》的成功在於將本土社交媒體文化呈現在電視上，把大台很多不敢播放的敏感內容搬上螢幕。例如，「有請小鳳姐」那種冷嘲建制派的政治隱喻、「繁忙兒童合唱團」主音歌手「劉小華」小朋友獨唱《補充練習無間做》時唱出粗口歌詞、邀請已遭各大傳媒封殺的何韻詩上台唱歌、邀請已離開大台的演員（河國榮、盧海鵬）、新聞記者（方健儀）表演，凡此種種都是衝着大台日漸保守及維穩的文化而來。

該晚的《典禮》很快便成為社交媒體的熱話，面書亦不斷被《典禮》的笑料及演出「洗版」。但評價並不全是讚好，也有不少嚴厲批評。爭論的焦點並非《典禮》本身的質素，而是《100 毛》是否真的如同部分 KOL（Key Opinion Leader）所言，有資格代表「良心媒體」。

1 對《典禮》的否定

事緣，當晚有不少對《典禮》有正面評價的「毛孩」（《100 毛》粉絲）及 KOL 都在面書的「標籤」（hashtag）中多謝其中一個贊助單位 Shell 石油公司。由於該石油公司在環保議題上，一直被視為一家不道德的企業，故而惹來一些環保組織及左翼時事評論人提出異議。例如，學術工作者莫哲暉在個人面書中寫道：

「我中學讀地理，讀過環保議題。我好記得自己搵過資料，講到有一間石油公司聯合 Nigeria 政府殺害環保人權衛士 Ken Saro-Wiwa。嗰間石油公司，叫 Shell。唔好多謝得咁 happy 咁熱情。你會話：一晚半晚，有咩所謂？你呢啲左膠寧舍麻煩。我唔認為呢啲叫左膠，呢啲叫 consistent。Shell 就係想要呢一晚半晚，呢啲正正係贊助嘅價值。」（莫哲暉，2016）

另有一位網名 Tam Daniel 的網民也在個人面書中寫道：

「我不迷戀道德，更不是環保撻。我朋友駕車到哪裡入油我也無所謂。正如我會偶然幫襯麥當勞。但我相信人應盡可能正視歷史，認清問題，了解我們生活中被隱藏的真實一面，對宰制維持多一點點戒懼。將心比己，有錢收可能我都會收，但賣廣告不是一切，無須玩到貼埋大床，把 marketing 的興奮放到宇宙咁大。」（Daniel, 2016）

明顯地，批評者認為，大眾不應因為 Shell 肯支持《100 毛》這類敢於發聲的小眾媒體，便不問就裏起來，替 Shell 這類不道德的大財團帶上道德光環，進行宣傳，甚或洗底。

基於這種不應盲撐失德大財團的立場，《100 毛》常對社會時事，僅作冷嘲熱諷的方針，也一併受到批評。例如，莫哲暉進而指出：

「《100 毛》確實係玩政治戲謔，但反抗意識其實頗低。《100 毛》嘅定位，係一盤生意，一盤靠抽下政治水去取悅年輕人嘅生意，主線係娛樂，而唔係反抗或不屈服。好多朋友話，《100 毛》起碼可以令本身唔關心政

治嘅人關心政治……問題係呢種政治教育最終有否導向認真對待政治、分析政治，甚至起而反抗嘅力量？暫時而言，似乎無。大家睇《100毛》，都係為食花生……。但當政治娛樂化花生慢慢成為理解政治嘅主流，而驅逐（crowd-out）嚴肅政治，就係問題。咁樣係咪我守舊呢，可能係。」（莫哲暉，2016）

與此同時，莫哲暉也趁機提到林日曦本人有何不是之處：

「我好記得，《100毛》老闆林日曦同蔣麗芸一齊幫ViuTv拍過真人show。當預告片流出時，有人批評林無禮貌，唔同蔣交流。然後林就煞有介事咁在fb反擊，講到自己好清高。但我即時諗：如果你真係咁清高，首先，點解你會願意接拍呢套節目，願意同蔣合作？唔通有政治壓力要你一定要同蔣拍節目？其實頗反映到《100毛》嘅路線：原則唔緊要，最緊要有話題、有bites。」（同上）

對批評者而言，雖然林日曦常在面書上表現得不屑一切，頗清高似的，但看深入點，這只不過是一場以假當真的真人娛樂騷罷了。

這就是說，批評者認為《100毛》對建制、對政府、對保守政治的冷嘲熱諷，仍是一種保守的、犬儒的、對社會未能帶來解放的「偽解放」，因為這些冷嘲熱諷對社會問題，未能提供任何深度分析，對受眾的啟發，也只是停留在「剝花生」式的看熱鬧層次而已。《100毛》終歸只是一盤生意，由它推動的政治批判及反建制言論，只是包裝生意的一套手法。

2 對《典禮》的肯定

面對這些近左翼批判，不少支持《100毛》的博客及KOL不禁在在網上提出反駁，直指這是一種「左膠」的、苦行僧式的禁慾主義舉動。例如：網名 Sam Yiu Tong Wong 的網民在個人面書中指出：

「好心啦，我知你投入社運、我知你勇武、我知你眾人皆醉我獨醒。但唔使一年365日，一日24小時，都懶嚴肅懶繃緊啫下話？家盞你苦行憎嚟咩？就算你係咁，都唔使逼個個好似你咁啫下。」(S.Y.T. Wong, 2016)

常在不同媒體發表評論兼主持節目的活躍學者王慧麟亦批評：

「響香港做左翼，係相當辛苦，辛苦到連啲娛樂節目，每一個 segment，都要煞有介事地把相應的左翼大師理論擲出來，對住視頻批判一番。唔使咁嘅~~~~輕鬆下啦，樣樣都要煞有介事，只會離開群眾越來越遠。」(健吾，2016)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對《典禮》的支持者是從後雨傘運動的視野出發，認為《典禮》對建立後雨傘主體有很大的打氣作用。例如，新聞工作者何雪瑩說：

「畢業N年後我想對老師說，今晚的『分獎典禮』是我們對嬰兒潮一代高呼我來了的宣言。例如整晚典禮都是廢青前廢青後，阿叻說這些網民們在現實生活中都是失敗者，可是在我身邊看得一樣肉緊的大學同學，一個是大學行政人員，另一個是獅子銀行管理層。中

環海旁的放映會，擠滿一班西裝友。我們不介意你們說我是廢青，我們會以廢青自居；廢青也面對生活的各種壓力，一樣要供樓返工，但起碼搵錢不是至高無上，更不是唯一。」（何雪瑩，2016）

「廢青」往往就是後雨傘一代的指稱。從何雪瑩的評論可見，該晚的《典禮》已跟「廢青」這個身分連在一起，成為「廢青」的象徵資本及認同元素。當該晚的《典禮》重新演繹陳冠希的《香港地》時，這就更具重新界定本土意義及香港人身分的重大作用。所以，何雪瑩如此續言：

「評論者早已指出一國兩制以03年作為分水嶺：03年前北京放手不管，廿三條一役後一國先於兩制。我們走過自由行釋法國民教育普教中催淚彈佔中以至還未水落石出的銅鑼灣書店，兩個版本的《香港地》提醒我們，香港人身份早已回不去了。」（同上）

同樣屬於新聞工作者的區家麟也指出：

「一首歌，一場敢想敢做的頒獎大騷，重新呈現被消失中的香港，重新定義香港精神：不屈、不認命、不習以為常，一同撐住，持守我們一直以來所珍重的價值。」（區家麟，2016）

因此，這類評論者認為《典禮》的冷嘲熱諷不是消極，而是好像何雪瑩所言，屬於對抗強權政治的武器：

「毛記這大半年來為廢青提供無限歡笑，可是我們心裏明白促成笑聲的是無盡的淚水和無力感。當世事愈來愈荒謬，當所有行動無法改變現實，二次創作和惡搞

的幽默諧謔成為了對抗荒誕的利器。生活已經絕望，分獎典禮為我們提供現實出口，起碼可以得啖笑開心下。」(何雪瑩，2016)

本土研究者及藝術工作者黃宇軒更認為，《典禮》開始了一場香港人拒絕向現實屈服的運動：

「香港人，一齊跟住毛記電視咁，同當權者講，笑你就係笑你，呔你就係呔你！……他日睇返香港歷史，《100毛》會唔會一個唔覺意就係呢個城市既『膠人』，開始左一場唔向現實屈服既運動。搞頒獎禮聽音樂唔屈服，就可以每個環節都唔屈服！」(黃宇軒，2016)

針對犬儒的指控，一直參與民間社會的音樂工作者周博賢則反過來指出，《100毛》不單不是犬儒而是創造改變社會力量的條件：

「我個人傾向支持任何通過 create (創造) 一啲嘢出嚟試圖改善現況嘅努力，因為我總覺得只要創造咗啲嘢，效果其實係讓子彈飛，可能有人會變得犬，笑完當搞掂，但難保有人之後會覺得充滿力量，繼而投身改變現況嘅行列。」(周博賢，2016)

簡而言之，《典禮》對部分雨傘運動的支持者來說是一次後雨傘運動的「文化政治運動」，而非單純屬於一場娛樂表演，更不應因為 Shell 的爭議而看不見它對雨傘運動一代的本土意義。

三 快感與政治：曖昧的辯證關係

由《典禮》引發的上述爭議，既跟左翼思想，也跟文化研

究內部一直存在的理論爭議其實一脈相承。當中的爭議點同樣是要追問由流行文化帶來的快感是不是有害的？流行文化有什麼政治作用？流行文化需要成為何種的文化政治（梁濃剛，1989）。故此，以下部分將先從現有的學術理論入手，然後繼續檢視由《典禮》引發的爭議有什麼需要正視的重大教訓。

1 文化理論的快感與反快感論爭

傳統的馬克思理論，例如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一直都對流行文化產生的快感提出批判。一方面，他們認為流行文化（電影、電視或流行音樂）的快感，都是庸俗的快感，只是資本家用以刺激消費及掩飾他們剝削勞動階層的「糖衣毒藥」（這跟《典禮》反對者的論點基本相同）。另一方面，法蘭克福學派的多位學者，如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對當代文化藝術的思考是建基在他們曾面臨納粹屠猶的大屠殺事件（the Holocaust）。故此，他們又認為，在充滿不義及苦難的世界，娛樂性的快感經驗根本盛載不了受苦者因暴力帶來的痛苦。阿多諾在其鉅著《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中指出：「內在於所有歡快藝術，尤其是娛樂形式中的非正義行為，是抵制死者之苦難的非正義行為，那苦難是積累起來的，是難以言表的。」（阿多諾，1998：頁71）由此可見，對阿多諾而言，娛樂文化的快感對處身在苦難的百姓，只是逃避現實的安慰品，未能幫助百姓正視現實的黑暗，所以真正的藝術應該是要令人銘記苦難，而不是以庸俗的快感來麻醉人心。

即使有學者反問，不少流行文化，如搖滾音樂，不是經常都對資本主義作出批判嗎？可是正如英國左翼學者費沙（Mark Fisher）指出，無論這類流行音樂怎樣批判資本主義，

流行文化最終都是建議人們接受資本主義的現實性 (capitalist realism)，沒有提供改變資本主義問題的另類方案，尤甚者就是告訴人們資本主義比起法西斯主義已好很多，對體制有些微調已應滿足，不應妄圖找出別的體制取代資本主義。就此，費沙曾以 1985 年的 Band Aid 為例，說明這類狀似激進的流行文化如何令大眾走不出資本主義的操控及想像，充其量就是叫人們一起關心一下個體的饑荒問題，卻無意推動系統性的改革 (Fisher, 2009: pp.5-15)。

然而，這也不是所有左翼學者都對流行文化帶給大眾的快感持否定態度。相反，現有不少左翼學者不但覺得這些快感無害，還相信這些快感是有解放作用。早年的馬克思主義劇作家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便指出，由文化衍生的快感有助受眾反思群眾跟社會的關係。由他創作出來的史詩劇場 (epic theatre) 往往是充滿娛樂性之同時，也讓受眾從享受着作品的睿智及幽默中反思工人階級的社會處境 (Harvey, 1982; Eagleton, 1987)。若要有效掌握這類認同流行文化快感的左翼觀點，這就不得不提法國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為了批判當時法國左翼對快感感官經驗的排斥，巴特早在 1970 年代，便寫了《文之悅》(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一書，指出在閱讀上獲取近乎狂喜的快感經驗，不應有任何罪惡感，奈何由於知識分子往往看重內容的意義，因而貶低了閱讀的快樂狀態，以致看不見快感的「革命性」。故此，巴特提醒我們務須能夠區分兩種快感：「快樂」(pleasure/plaisir) 及「狂喜」(bliss/jouissance)，巴特指出，閱讀經典的文學作品時，往往令讀者獲取一種令主體感覺安穩、放鬆及自在的感覺，即「快樂」，它不但沒有動搖主體自身的價值，還進一步固定自我的一致性 (Barthes, 1985: p.206)，所以，某程度來說，「快樂」是一種保守性的快感，它往往強化一個人既有的主流社會身

分，卻沒有想過去挑戰它。相反，巴特欣賞的「狂喜」則是一種帶有顛覆性的快感閱讀，它不會強化主體自身的一切，反而令主體迷失，並且不斷挑戰及改變主體、想像及語言，直至主體完全地蛻變（Fiske, 1991: pp.227-239）。對巴特而言，「狂喜」的文本是少有的，且是一些好像薩德（Marquis de Sade）的情色作品那般，非合法性的、顛覆主流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邊緣作品。換言之，快感是有保守性及顛覆性，若是屬於「快樂」的一種，就只是持續地、沒有批判地肯定一己的文化身分，若是屬於「狂喜」的一種，則能動搖將人一直賴之而存活的社會身分、文化想像及道德界線。

巴特的快感論，對於 1980 年代興起的閱聽者研究（the audience research）、消費者研究或次文化研究（the sub-culture studies）影響是甚深的。例如，一些左翼學者如費斯克（John Fiske）就是受巴特的「狂喜」理論啟發，指出流行文化的消費者往往也有自己的解讀各樣流行文化的方式。受眾從文本的創造性閱讀中所帶來的快感（「狂喜」），更能衍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重要的是，受眾可以在與文本的內容（即使內容是充滿保守意識形態）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另類詮釋，築起一己的獨立主體性。例如，在閱讀一部有關商界勾心鬥角的影片時，受眾不一定被當中扮演資本家的角色洗腦，反而他們在資本家的身上建立一種反抗意識，並且用以了解他們當下受到壓迫的生活處境。相反，傳統左翼的反快感取向（如阿多諾），只是精英主義作祟，不但看低並否定消費者已有的批判及自主能力（Nava, 1991: p.262），亦自絕於羣眾，無助對社會文化作出改變。（這跟《典禮》支持者的立場基本相同）。

2 犬儒抑或解放：快感的曖昧辯證

這些正反雙方環繞流行文化的快感討論，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有助我們對《典禮》作出切要的反省。首先，對流行文化的快感持否定態度的左翼講法，往往側重於一種宏觀政治經濟文化的批判方式，即看到資本主義這大怪獸無處不在的滲透性，以及其不會輕易錯過任何一個鞏固自身意識形態的細節（費沙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現實性）。雖則個別讀者能對文本有另類及自主的閱讀，但這不代表要浪漫化個別讀者的能力而忽視文化工業背後由市場或大財團主導的經濟現實。正如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麥克蓋根（Jim McGuigan）在其名著《文化民粹主義》（*Cultural Populism*）一書指出，個別文化研究學者如費斯克，只盲目擁抱個別消費者／庶民的流行文化快感經驗，卻缺乏對背後剝削性的經濟消費生產模式，特別是當中的宰制性及意識形態的批判，也放棄了對文化內容的評價，最終文化研究只會成為一種新自由消費文化的共犯，並衍生一種「缺乏批判性的民粹主義」（uncritical populism）（McGuigan, 1992: pp.71-84）。

所以，筆者認為《典禮》反對者的論點不是無的放矢，他們的憂慮是有理據的，特別是竟有部分受挫的本土主義者及雨傘運動支持者，由於急於要有「止痛藥」而浪漫化地想像《100毛》為一種抗爭式、具產生變化力量的政治論述，無視《100毛》基本上是一盤商業生意，而且是由跟內地有密切關係的萬華媒體持有。近年，《100毛》出現大量植入式廣告來推廣銀行信用卡或咖啡飲品，也見《100毛》是由商業模式操作的。

這並不是說，商業媒體就不能同時是政治的抗爭媒體，正如《蘋果日報》也可以是反政府的媒體（當然付出的代價是廣告收入大幅下跌）。但反對者的論點確能好讓我們更清醒地看到，《典禮》及《100毛》的商業本質如何只從屬於本土層面

的政治道德，卻忽視全球層面的經濟道德。誠然，要《100毛》不找贊助是不設實際的，但筆者認為《100毛》在將來的日子，如要踐行一種更有社會承擔的快感政治，那就不僅要留心贊助商的政治立場，也要留心贊助商的環保立場、勞工立場，以至其他重大議題的立場。若《100毛》真的不想公眾只當《100毛》為一盤生意來看待。

另一個典禮正反雙方都忽視卻又非常重要的問題，乃是快感是可以有不同的性質，產生不同的主體作用及政治效果。其實，當代文化理論在處理快感政治的課題上，除了從政治經濟的宏觀框架剖析生產快感的機制外，也有對各種快感與主體建構的關係作深入的分析，從而看出由快感所產生出來的激進作用。若以《典禮》帶給本土大眾的快感來說，當中明顯是有一定的「狂喜」成分。例如，當河國榮這位來港多年的澳洲人，以純正的廣東話唱出新改編的《香港地》時，就是動搖了香港人對自我身分的了解，原來一個外來者只要他認同香港，願以一己的人生與香港同在，即使他不是華人，也是香港人。河國榮的當晚演出，既感動，又震動，特別是配合着重新改寫有關香港日漸衰亡的新《香港地》歌詞，最是使得今天香港人要對自身困局作出反省。

由熊熊兒童合唱團小學生組成的「繁忙兒童合唱團」，其中壓軸出場的小學生「劉小華」獨唱由《無間道》改編的《補充練習無間做》，也帶來極大的「狂喜」效果。作為小學生的「劉小華」以嘲諷風格，唱出香港學生在今天扭曲的香港教育的無奈。即使兒童表演不是新鮮事，嘲諷香港教育也不是新鮮的內容，但由小學生唱出卻有一種受害者自況的震動力，令人發笑之餘，也對不少「怪獸家長」及教育制度帶來不少批判反省。所以，筆者同意部分支持者所說，《典禮》對今天受壓迫的香港人來說是「一場唔向現實屈服嘅運動」，甚至是一次建立本

土文化身分認同的媒體事件。相對於保守的愛國論述及其衍生的國民教育，《典禮》衍生的快感經驗絕不算是一種保守的、全屬不具挑戰體制的快感，而是一種從被壓迫的香港人位置生產出來的「狂喜」。

只不過，《典禮》的本土想像確有好些過度偏狹之處。由河國榮唱出，經二次創作後的《香港地》歌詞有以下一段：

七百萬隻螞蟻 唔容易走晒出嚟
嚮住同一個電視睇 一定會鍾意梁烈唯
係真香港人 當然會識英雄輝
係真香港人 可以睇埋同一篇潮文
你一崇拜馬雲 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

就如何界定香港人來說，這段歌詞不但太過簡化，也扭曲地把本應不一而足的文化判斷以單一的文化判斷來衡量。眾所周知，香港實乃一個文化混雜的地方，不同的社群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即使有人要守護本土文化（如粵語文化），但也不代表可以把特定的文化看成界定何謂香港人的唯一標準。所以，筆者認為大眾也得小心《典禮》這種對香港人的單一身分想像，因一不小心也可以成為過度保守而又充滿排斥性的一種本土身分認同，正如一度在香港出現的「反蝗」（反大陸人）論述和行動。事實上，《100毛》為了取悅「毛孩」也常在其面書及雜誌，嘲笑大陸人為「強國人」，強化「香港人」為受壓迫者的自我想像。與此同時，《100毛》最擅長發放的笑彈就是拿定型來開玩笑，並成功建構了「專家 Dickson」的宅男形象，以及「黃慘盈」的港女形象。從這點來看，《典禮》也在鞏固主流的本土（性別）文化身分。是故，由《典禮》產生出來的部分快感，不得不說是一種保守性的，正如巴特所言，只是強化而沒有動搖一己主體性的「快樂」。

因此，由《典禮》帶給大眾的快感可以是既顛覆又保守的。相對於垂直的愛國霸權，《典禮》的快感是顛覆性的；相對於本應多元的本土文化，《典禮》的快感是保守性的。任何一刀切的判斷都對《典禮》的雙重快感經驗，以至是多重快感經驗，作出脫節的扣連。或許，這是何以應費斯克認為，大眾媒體總是去中心的，可以推動符號民主（semiotic democracy）。既是如此，這就更有必要思考能夠帶來社會轉化的快感政治，以免跌入表面激進、內裏保守的犬儒政治。

因應這樣的認知及實踐需要，美國左翼文化評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早年的一篇談論快感政治的文章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啟迪。他指出：快感政治既要針對本土的問題作出回應，但也需要一種帶來社會轉化的、革命性的烏托邦想像，才能真正推動具有進步意義的快感政治。要不然，這種快感政治不會走得很遠，也總會困在本土或個別小圈子的關注之內，僅屬圍爐取暖的頹廢舉動，最終永遠不能帶來真正的解放。詹明信所以肯定快感是具有革命的潛力，因他相信快感能夠震動主體的物質身體，而不限於主體的精神意識，但前提是當中的快感務須指向改變社會不公，要不然，當中的快感只會屬於消費主義式的享樂主義（Jameson, 1983）。

乍看起來，這樣要求《100毛》這一個小眾而又小圈子的商業媒體，要有烏托邦想像，一個遠大的社會改革藍圖，未免陳義過高。但筆者認為《100毛》既然有膽識挑戰當前香港不同的政治禁區，這種要求也是合理的。正如馬傑偉指出：

「毛記出品十分本土，由兒童教育困境、毒男生存求偶之道，到『亞視永恆』這一類香港人才識笑的笑話。香港人坐困愁城難以排解的悲情與無奈，毛記用誇張、認真唔認真、甩甩漏漏、玩到盡又玩自己、嬉皮

笑臉、苦中作樂、自認廢人但又肯付出真感情、真性情。毛記粉絲開懷大笑地認同這種情緒狀態，並作為自處之道，應用於身處的香港。Pop local 就是大家『圍威喂』（小圈子）在這種感情結構中 feel good，深層政治價值觀其實不一定浮出表層。」（馬傑偉，2016）

若然《100毛》當下的成功仍僅指有助一班「毛孩」或剛畢業的職青在「圍爐取暖」，或讓後雨傘一代尋找自戀的身影，那《100毛》若要贏得更多游離觀眾的認同，就應如馬傑偉最後指出，不可以只滿足於討好粉絲，而是要向廣大觀眾做出一個「真·娛樂大騷」，以引起更多的社會認同（同上）。

四 後記

筆者曾於2016年「第七屆香港社會與文化研究大會」宣讀本文的初步構想。在場就有一位《100毛》的編輯於會後向筆者指出，他們也曾有過內部討論，自覺不可停留在冷嘲熱諷的搞笑風格，反而需要有更多對社會作深入調查的報道，這是何以他們會在《毛記電視》加入《星期三港案》這個節目，以記實的表達手法，探討諸如弱勢群體、銅鑼灣書店等，當前的本土社會問題。這就正好說明要令快感政治指向社會轉化，具有革命性的烏托邦想像，確是「良心媒體」也自知要做的事。

參考文獻

- 不詳（2015）：〈《100毛》林日曦：創作就是不斷反叛〉，載《iMoney 智富雜誌》，第406期。
- 何雪瑩（2016），〈毛記分獎典禮——打一場漂亮的媒體政治文化游擊戰〉，<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112-opinion-kittyho-tvmost/>，載《端》，

瀏覽日期：2016年1月12日。

阿多諾（1998）：《美學理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阿果（2016），〈《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100%E6%AF%9B-%E5%B0%B1%E6%98%AF%E9%80%99%E5%B9%B4%E4%BB%A3%E7%9A%84-%E8%99%9F%E5%A4%96/>，載《立場新聞》，瀏覽日期：2016年1月12日。

周博賢面書：<https://www.facebook.com/adrian.chow.1232/posts/10154040836606758?fref=nf>，瀏覽日期：2016年1月12日。

馬傑偉（2016），〈馬傑偉與學生對談《毛記台慶》：悶出鳥來 v.s. 看哭了〉<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12-opinion-ericma-tvmost/>，載《端》，瀏覽日期2016年5月12日。

梁濃剛（1989）：《快感與兩性差別：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的一些側面》，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莫哲暉（2016），〈尋日同朋友在 whatsapp group 激辯 100 毛。今朝開 fb 先發覺原來 I am not alone。咁我又不妨講多兩句：〉，<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pignews/posts/938205926233817>，瀏覽日期：2016年1月12日。

區家麟（2016），〈被強行消失的真香港〉，http://aukalun.blogspot.hk/2016/01/blog-post_12.html，載《潮池》，瀏覽日期：2016年1月12日。

黃宇軒（2016），〈辦頒獎禮不屈服，香港人每個環節也可不屈服！〉，<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112-opinion-sampsonwong-tvmost/>，載《端》，瀏覽日期2016年1月12日。

健吾（2016），〈王慧麟先生語〉，<https://www.facebook.com/kengopage/photos/a.374061035988961.83128.373889722672759/1011858598875865/?type=3&theater>，瀏覽日期：2016年1月12日。

Patrick Yip（2016），〈幾多歲嘅人會讚好 100 毛？我用數據答你（好似係）〉，<http://patrickyip.co/blog/100most/>，瀏覽日期：2016年2月3日。

S.Y.T. Wong（2016），〈幾年前，巨鴨抵港，港人鬱悶稍得抒解，大家開心一下，影下相，笑下，人人也開懷。〉，<https://www.facebook.com/samwongyt/posts/10153856897539402?fref=nf>，瀏覽日期：2016年1月12日。

Tam Daniel（2016），〈【多謝 Shell】〉，<https://www.facebook.com/tam.daniel/posts/10153357394608652>，瀏覽日期：2016年1月12日。

- Barthes, Roland (1985), *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terviews 1962-198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Eagleton, Terry (1987), "How do we Face the Pagodas?", *New Statesman*, March.
- Fiske, John (1991),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Fisher, Mark (2009),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Winchester: Zero Books.
- Harvey, Sylvia (1982), "Whose Brecht?: Memories of the Eighties", *Screen*, Vol. 23, No. 1, May, pp.45 – 59.
- Jameson, Fredric (1983), "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 in Tony Benett (ed.), *Formation of Pleasure*. London: Routledge, pp.1-14.
- McGuigan, Jim (1992), *Cultural Populism*. London: Routledge.
- Nava, Mica (1991), "Consumer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Studies*, Vol. 5, No. 2, May, pp 157-173.